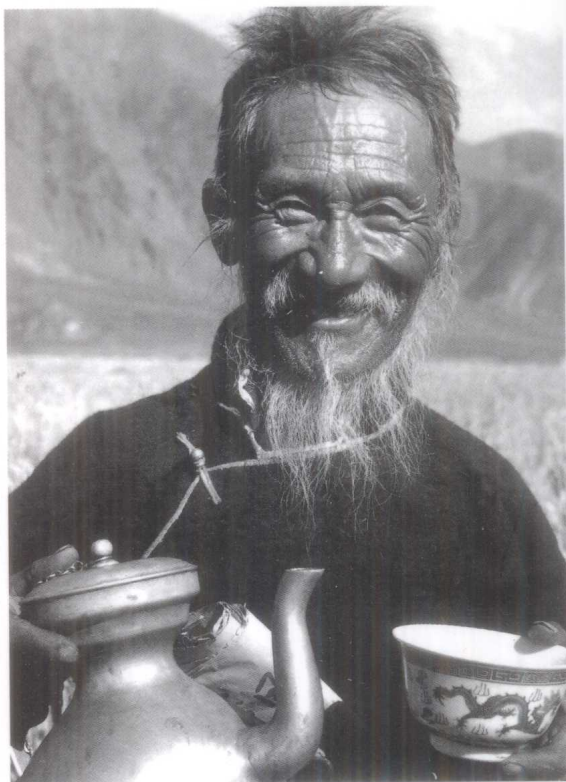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百万农奴 站起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孟黎莎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万农奴站起来/[美]斯特朗著;孟黎莎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53-177-2

I. 百... II. ①斯...②孟... III. 社会主义革命-史料-西藏-1959

IV. K29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1156号

百万农奴站起来

[美]斯特朗著 孟黎莎译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177-2/K·219

定 价:25.60 元

序言

亲切的斯特朗，熟悉的西藏

卢小飞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我们深为景仰的新闻前辈。

最早听说这个名字还在少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让我们记住了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谈话的那个女记者。而她，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在当时整个文明世界对于中国内战的缘由尚未认识，甚至还存在人为歪曲的政治态势下，向世界传播了来自延安而非西安的声音。在后来国际反华舆论对中国实施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她坚持尊重客观事实，甚至敢于逆势而上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体现出一个优秀记者坚持真理的高贵品格和无畏气概，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斯特朗先后六次来中国旅行采访，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使她最终选择中国作为人生的终点。这本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书是她七十三岁时的作品，反映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的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变迁，记录了西藏如何从一个反动黑暗的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其史料素材全部是作者亲自采访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并以此正面回答了那个时代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西藏话题，这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为一名政治记者的强项。这些，使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始终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由于工作的忙碌和家务的缠身，及至打开厚厚一摞书稿往往就到深夜了，加上间或出

差外地，不方便带上书稿，出差回来不免要翻回前面的章节重新温习，每一次都带着急不可耐的心情，那里面的地名、人名几乎都认得，熟悉而又亲切的酥油泥土气息每每扑面而来。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记者笔下是那么富有活力。对于我们这些将青春抛洒在西藏，且又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心生景仰？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难怪爱泼斯坦称它“是认识 and 了解西藏的最佳读本”。

本书的架构以推翻西藏封建农奴制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为轴心，以探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与执行”“平息西藏叛乱与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这样一些热点问题为切入点，以西方记者的眼光扫描当代西藏的变革。书中自然要涉及众多历史人物，既有当代西藏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诸如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有贵族妇女、工作队干部、基层农牧民和寺庙僧人等等，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都镌刻在当代西藏历史画卷上，成为钢铁筑就的历史见证。这些采访对象的选择与发问，为我们勾勒出斯特朗观察西藏社会的轨迹，让我们体味到一个优秀政治记者如何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如何善于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如何在语言不通且采访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拿到自己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得出完全属于自己从而属于客观世界的结论。斯特朗从丰富的采访经验中锤炼出一种敏捷的思维和锐利的眼光，并以准确而细腻地描述人物和事物见长，甚至细碎到自己如何克服高山缺氧、如何被人抬着登上布达拉宫，这使得她笔下的西藏社会保留了原汁原味。难怪爱泼斯坦叹服她以撰写历史见长，而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与那些对中国革命带有偏见，进而抹黑新中国的西方媒体形成鲜明对照。

与通常的走马观花式的采访笔录完全不同，斯特朗深入许

多农奴家中，走访了过去的差巴、堆穷和朗生，了解农奴制度的组织结构，进而对阶级关系状况进行了剖析。对农奴制庄园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后，她又去采访西藏的寺院，深入了解寺院内部的组织结构，僧侣之间的阶级关系，僧侣集团的财产占有，寺院上层对领地内农奴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等等。对于整个西藏农奴制社会寻根问底式的采访，以及对农奴中不同社会阶层状况层层剥笋似的探究，完全没有生涩环境下经常出现的那种囫圇吞枣。她对朗生、差巴、堆穷都有详细的分析，是真正的有“分”有“析”，并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了比较，指出了奴隶制、农奴制、自由民的异同，于是得以对西藏社会作出深刻与透彻的观察，这正反映了斯特朗采访作风的深入扎实和做事的一丝不苟。不要说一个外国记者，就是我们许多前往西藏采访的中国记者，又有多少能够清晰地说出“堆穷”“差巴”和“朗生”这些统称为农奴的下层百姓究竟有些什么不同。而她，一个凭借着两道翻译挖掘素材的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做到了。

当成百上千家西方报纸轰炸似的渲染着西藏“问题的严重性”时，她以记者亲历的笔法生动描述了百万农奴在获得翻身解放后的精神面貌。对于人物的描写恰恰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观察视角。她娓娓讲述了差巴德吉的遭遇，以及德吉和丈夫彭措次仁的苦难家史，尤其是彭措次仁被庄园管家指控偷了领主女儿漂亮的马鞍而被先后关进庄园的地牢和布达拉宫脚下的蝎子洞，惨遭皮肉之苦的故事；讲述了噶厦出尔反尔撕毁《十七条协议》的前后以及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仁增因为拒绝参加叛乱活动，而被野蛮鞭打的故事和大昭寺贫苦僧侣的集体控诉；讲述了拉萨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把山南地区当作长期游击战的总指挥中心和基地，但是却忘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广大农奴长期饱受压迫剥削和野蛮蹂躏，这决定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与西藏人民的选择是背道而驰的。她描述了平叛改革后翻身农奴的由衷喜悦，诸如小伙子向

姑娘抛送秋波，主人虔诚地敬献哈达，老人好奇地摸摸作者的下巴，秋后人们在望果节上的载歌载舞，这些细节刻画出西藏老百姓的可爱与率真，只有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记者，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对新生活的赞美，

有意思的是，书中介绍的许多人物也是我采访过甚至十分熟悉的人，由此产生的亲切感拉近了与这位大记者的距离，只不过我采访的时间延后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而这恰恰印证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比如，书中多次提到的娜珍，作者笔下正处于热恋期的美丽姑娘，一个来自四川巴塘藏区的女工作队员，当时正在大昭寺蹲点开展民主改革工作，尚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到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的妇联主席，我那时正是一名年轻的跑口记者，多次参加妇联的活动，年富力强而又正直善良的娜珍不仅给了我许多帮助与关照，还给了我许多人生的启迪。再比如，书中多处谈到的朗敦夫人，恰是我好友白姆的妈妈，她们母女给予西藏民主改革的贡献有口皆碑，这也印证了民主改革对于爱国上层人士产生的积极影响。书中引述了阿沛夫人对妇女状况的态度，居然与笔者今年在她家里访谈时的观点一致。阿沛·才旦卓嘎是全国妇联第四届至第七届副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她始终支持和理解丈夫的选择，为西藏妇女儿童事业尽心竭力。她认为民主改革后，西藏妇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藏妇女的解放与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试金石。

陪同斯特朗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马宁轩曾经是我的同事，在我还是西藏日报社一名年轻记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西藏日报社藏文部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马宁轩回忆陪同斯特朗采访的经历时十分感慨，“她已七十三岁，头发全白，拄着拐杖，略显疲惫，但精神矍铄，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目光中深藏着追求新闻的执著。”“老太太拄着拐杖，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但她没有间断过一天的采访。就是在办公后的休息时间里，也随时蹒跚地走到院里，仰望巍峨的布达拉

宫，用眼采访，看平叛的炮火是否毁了建筑物。她看到达赖喇嘛的寝宫、佛事殿等布达拉宫所有建筑物完好无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对斯特朗的职业素养赞叹不已。在短短一个来月的采访时间里，斯特朗对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庄园、领地、农奴、农奴主代理人、贵族、寺院、地方政府以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颇深的了解。光是为了搞清楚乌拉差役、苛捐杂税、高利贷和还不完的子孙债等剥削情况，她就在蔡公堂的农奴协会与农户们整整算了一天的账，有时一个数字反复核对四五次，直到没有问题为止。

今天，此书得以再版，要称道译者和编者以及出版者的眼光。全书字数不多但在史料价值方面毫不逊色，对于今人认识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书中关于寺院僧侣集团阶级矛盾的描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管理寺院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书中关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具象描述，令后人在观察西藏问题时具有了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眼界；书中各类人物的细节描写印证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些民主改革老照片的真实性。给予我们许多遐想的，是她在书中透露的西藏建设天堂的计划和提出了宗教改革的目标，并大胆设想西藏境内的两千多所寺庙全部停点酥油灯，而改用电灯替代，让西藏人民享受充足的酥油茶。这些袅袅的余音都留待读者继续品味。当然，它也提醒我们这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尤其是很多因为带“长”而不愿到一线采访的新闻人，千万不要忘了，七十三岁的老记者斯特朗具有的职业精神。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有人仍在继续着以有色镜片透视西藏的行径。斯特朗的老朋友、著名左翼作家爱泼斯坦早在当年此书英文版的序言里，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某些反华分子散布的“藏人被毁灭”的谎言；同时，他也批评了自由主义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暧昧，诸如“北京好歹还是给西藏带去了些好处”的言论。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时隔五十年，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已然不再是当年那样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而敌对势力的本质却并没有在强大的事实面前有丝毫的改变，甚至与当年的叫嚣如出一辙。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五十年前的那些老话，无视五十年里西藏所发生的进步。这样一种结果恰恰又回到了斯特朗当年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的话题。历史的讽刺是如此绝妙。

二〇〇九年十月

一九六五年英文版序言

艾斯瑞尔·爱泼斯坦

人们可以从不少读物中了解“世界屋脊”上那场惊人的变革，但最佳读本仍要数《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这本目睹记写于一九五九年，正值西藏变革的关键时刻，当时农奴主的叛乱被平息，民主改革刚开始。该书于一九六五年又可喜地再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经历了漫长的筹备过程，终于成立了，该书的再版正是这一时刻的自然产物。随着生产权力回到农奴、奴隶手中，随着各级选举的结束，农奴、奴隶自己政权的建立，西藏人民开始从胜利的民主改革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以撰写历史的笔触来报导一种长期存在的本质是少见的，可这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报导习惯。年满八十的她从过去丰富的经验中锤炼出一种从眼下事物的发展中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未来的本领。这是她自己的“秘密”所在，也是她充满活力著作的“秘密”所在。这“秘密”几乎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指引她了，那时她偶遇革命——列宁主义的革命——那是人民的黎明，是让人们充满信心，不断让他们快活的曙光。这种“秘密”加上她擅长表达的天赋以及接近事实的决心，使她成为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年史编纂者。这是因为她把接近真实和实际的发展真实地统一起来了。

我刚从西藏回来，在那儿住了一个月，这已是我第二次访藏了，我只想对该书已提供的丰富背景加些注释。

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自然的描写是正确的；对变革的重要性及不可抗拒性的报导也是正确的。西方和其他反动派依然在散布“藏人毁灭”的谎言。自由主义者已开始忠告：“北京好歹还是给西藏带去了些好处。”而安娜六年前就把握住了这场争论的大趋势，并理出了这场争论的头绪。她的书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许多民族，在获得解放后，是怎样满怀激情来帮助西藏的农奴、奴隶获得自身的解放的。

二、随后的几年里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些突出的成绩我综述如下：

人口的增长，现在西藏有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人，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还多；文化的提高，能用自己的语言识字的人至少增加了二十倍；政府的组阁，领导者已不再是一小撮僧人、农奴主和领主，经过民主选举的劳动者掌管着全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各种事务。七十一名县长中有十一名是女县长。过去的几年中培训出一万六千名藏族人才，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前的农奴和奴隶。这些人才现正从事着各项事业，有搞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从事教育、卫生工作的；还有搞国防工作的。

生产上，现在的粮食产量比六年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牛羊头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许多新的粮食品种、耕作工具以及新的播种方法使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畜牧业培育出优良畜种，建立了兽医站，并且采用了管理草场的新方法。工业开始发展，有六十七个地方材料加工厂，有满足基建要求的水泥厂和发电厂。西藏的工人阶级前不久还根本不存在呢，可现已有了两万五千人，其中许多年轻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们告别了压抑人性、贫困不堪的僧人生涯。

在农田灌溉方面，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湍急的水流建立发电站，解决能源问

题。开发水利刺激农牧民开始思考从目前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组向社会主义集体化（这种集体化目前叫合作社，但不久就叫公社了，公社是一种适宜于当地情况的形式，这种形式依然在讨论之中）过渡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西藏计划到一九七〇年，要在每个县、乡或公社建立发电站，这些地方都有有利的条件。目前那种小型的发电站已超负荷。我亲眼见到一个小发电站要提供三个村庄八十户人家的能源，要供给农舍、学校、俱乐部和会堂四百盏灯泡的用电。

拉萨正在变成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不久前，布达拉宫、寺庙和一些巨宅还矗立在一片破旧简陋的小屋之中，到处都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臭水沟。可现在拉萨已有了长长的柏油街道，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城里还铺设了地下排水管道，一九五九年时，整座城连一条这样的街道和排水管道都没有。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家庭照明用电可以得到满足，甚至连烧饭也时常可以用上电。前农奴、奴隶都免费用电。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可容纳一千两百人的大厅，此厅用于会议、演出和放映电影。城里还另有两家电影院。拉萨今年盖起了一个国营贸易中心，是新修的各种商店里最大的一座，在那儿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品小到针线纽扣，大到缝纫机、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这些商品都十分畅销，而买主正是前不久被当作商品买卖的人们。

拉萨到内地有些地区的航线已开通，有了机票销售站。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人们可以乘上西安和上海特造的大客车，这种车有氧气和暖气设备，是专为在高原行驶设计制造的。全区已有一万英里的汽车公路，七十一个县中六十五个县都通了公路。长途客车不仅跑通区内各地的公路，而且跑通内地的主干道，可以把旅客送至有铁路的地方，此外还跑通尼泊尔的国际公路，把旅客送到边境。

西藏革命展览馆是有名的第四建筑工程队在一九六五年修建的，就坐落在布达拉宫的前面。与那座著名的大宫殿相比，

展览馆反倒吸引了更多的“朝圣者”。在五万平方英尺的展厅里，布满了生动真实的展品，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西藏过去落后和今日进步的原因。这里的一部分展品是达赖喇嘛的宝藏，许多都是第一次从布达拉宫的密室里拿出来的，其中的珠宝、纯金器皿、法衣和裘皮简直不亚于克里姆林宫中沙皇的那些珠光宝气。不同的是，沙皇有千百万可剥削的人民，而达赖喇嘛只有百万畏惧他的人民。还有许多其他财宝被他带到了印度。

这座展览馆还介绍了农奴主叛乱以及他们接受外国支持的详细情况；介绍了土地牲畜重新分回到人民手里的详细情况；介绍了西藏人民得到中国其他地区大力援助的详细情况，其中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这是一支既战斗又工作的军队；还详细介绍了当地人民在生产、技术和学习上的进步情况。

一开始进步就如此之大，这是无法用尺度衡量的。在旧西藏，铁匠是最低贱的阶层，是些“无人愿碰”的最贫穷的人。曾经是铁匠和奴隶的达娃如今已成为拉萨新工程的一位极端负责任的保管员。他对我说：“我们不仅为建设而建设，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建设；我们也不是为工资才建设，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从未有过报酬；我们建设只是因为我们建设的是我们工人自己将享用的地方。”

事实上，以现在这种速度发展，整个西藏本身就在转世，是达赖喇嘛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转世，他又怎么可能想到呢！自从他走掉，虽然只有六个年头，西藏却发生了政治性的核分裂，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核聚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现已有了许多藏族党员）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引爆这个旧西藏，重建一个新西藏。这种爆破的反冲力震动了旧的农奴制社会，这个社会的毁灭是前不久的事情，十几岁的孩子都还记忆犹新，这个社会连同它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已属于过去一千年里的事了。

虽然年轻人比较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但寺庙开放、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受到尊敬。然而，上层僧人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如同贵族一样已不复存在了。

自从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以来，没有参加过叛乱的前统治阶级在西藏仍有一席之地，经济上，政府赎买了他们的封建财产，这使他们仍能保持与以改革前相同的生活水平。例如，班禅及其随员，政府以巨款买下了他们以前的房地产（班禅的扎什伦布寺就收到五百万元的赎买金）。但是所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是通过他们协力发展西藏而得到。如今西藏已掌握在以往被剥削者的手中，他们占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书中记载道，六年前她了解到班禅与改革的情况，当时班禅曾在他的教区作过许诺，说改革将留给他来搞。

革命的核分裂也是一种融合。农奴制一直是帝国主义者密谋恢复的制度，这一多少世纪来削弱西藏实质的吃人的制度现已被毁灭。如今的西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表现人民的美德、热情，更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同时，西藏也更加不可分割地加入了多民族中国的共同革命的考验时期。

毛泽东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与此相一致，中央政府代表在新生的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制度……它一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决不是农奴主或其他任何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团结一心，正在行使着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踏上了中国全民族所走的社会主义进步大道。

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书，你可以了解到西藏人民是怎样，又是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目 录

序言 亲切的斯特朗,熟悉的西藏	卢小飞 /1
一九六五年英文版序言	艾斯瑞尔·爱泼斯坦 /1

第一章 飞往西藏	/1
第二章 “豪华型”拉萨飞行	/12
第三章 第一次情况介绍会	/22
第四章 三月叛乱	/38
第五章 在拉萨参观	/57
第六章 大昭寺里的娜珍	/77
第七章 拉萨东边的村庄	/97
第八章 我上布达拉宫	/115
第九章 一座大寺院的改革	/132
第十章 哲蚌寺的僧人	/145
第十一章 农奴自己的第一次丰收	/161
第十二章 建设“天堂”	/181
编后	/198

附录 陪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记	马宁轩 /200
--------------------	----------

第一章

飞往西藏

“我们向你们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这趟旅行。陈毅^①同志一九五六年去了一趟拉萨，后来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甚至丧命于此行，此非耸人听闻。你们都必须通过体检，还将有一名医生随行，为的是作好预防，即便如此，也不可掉以轻心。有想退出的，请于明天中午前打电话给我们，想去的，请将费用汇来。”

我们在北京汇合，我们是十九名申请访藏的记者、作家、广播电视工作者。不算作为东道主前往的北京人民日报社的代表，我们十九人分别来自十一个国家。只有我是三天前才被批准的，我匆忙跑到北京医院做体检。那座漂亮的中心医院是由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很久以前修建的，看上去非常古老，却成为当今北京设施完善的医疗中心。

我的血压测量结果，高压一百三十，低压六十五，恰好在限度之内，可我七十三岁的高龄却是我的软肋。我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容易适应高海拔。拉萨海拔三千六百七十米（一万两千两百英尺），草原海拔升至四千五百米以上（一万五千英尺），

^① 外交部部长，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赴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飞行的海拔至少高达六千三百米（两万一千英尺）。我的心电图的结果极佳，医生在合格书上写道：“在特殊护理下可以进藏，切忌过度疲劳。”我要是有个好歹，他是不愿意被指责的。

我的东道主们把这份合格书看得很重。第一个特殊安排就是我的翻译曹凤凤将随行。她有时也为全团做做翻译——团队旅行，人人都想得到帮助——当然她的主要照顾对象是我，为减轻我的负担，帮我拿拿照相机，提提我的赫姆斯（Hermes）小号打字机，拎拎我的飞行睡袋，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像鹰一样盯住我，不是说“您现在最好去睡觉”，就是说“我会叫服务员把晚饭送到您的房间来……”

我们先去北戴河疗养，据说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起程去拉萨了，真希望起程的时间能够再往后延延。我需要一整个月的修养，因为我刚没日没夜地赶完《采访西藏人》一书，必须赶在北京八月酷暑之前，否则我就无法完成它了。此书刚送去印刷，我和凤凤就拿到了火车票和北戴河疗养院的订房单。说实话，他们来电话说我的进藏申请批准了，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我声明，“不休一趟假，我是不会去的”，他们说，“你看着办吧”。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海边，不假思索地对凤凤说：“这种团体旅行往往会推迟，没准我们会有两周的休息时间呢！”

海边，凉爽空气中的第一个夜晚是奇妙的，温和海水中的第一个晨泳是富有魔力的。两个星期的这种日子，哪怕就一个星期呢，都是一次真正的休息。然而，就那么一次美好的晨泳后，北京来了电话，通知我们星期六起程赴西藏。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起床了，乘五点的火车，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去参加了第一次情况介绍会，会上我们再次被告诫要“严肃对待这次旅行”。我在北戴河只休息了二十四小时，只游了一次泳，难道就这样去面对西藏了，想来真不甘心！

见到访问团成员，更加重了我的不安，他们都是男性，大

多都很年轻，后来得知团里还有一名女性，叫爱娃·西奥（Eva Siao），是民主德国电视台的摄像。他们个个精力旺盛、积极能干，可以参加一整天的活动，上午、中午、晚上连续活动，我怎么可能跟得上他们。况且一旦发现我是全团的累赘，那将是不可原谅的！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记者，而且是外国记者前往了解新的“民主西藏”的开始。新的西藏地方政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颁布决议，合法废除农奴制，这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律的实施有待组织，这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一切。

就在五个月前，拉萨爆发了叛乱，领导这场叛乱的是四大噶伦（Kaloons），他们是噶厦（Kashag）的大臣，共有六大噶伦。大寺院大都参与领导了这场叛乱。他们宣布西藏从中国脱离出去，并且用武力，包括大炮，攻击中央政府所在的办事处。这场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一些叛乱首领被逮捕，还有一些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叛乱事件总算打开了通往改革的道路。三月二十八日，占噶伦多数的叛乱首领准备逃往印度，中国国务院颁布特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即解散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地方政府，该筹委会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它比西藏历届地方政府都更具代表性，拥有更广泛的代表，因为它统一了先前一直交战的许多地方。

达赖喇嘛是该筹委会主席，即使他不在期间也保留其主席的职位。班禅额尔德尼为筹委会第一副主席，在等待达赖回归期间，被委任为代主席。筹委会开除了参加叛乱的成员，替换上新的成员。这样不用重新组阁政府，不改变全藏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接受的政府形式，然而，政策则改变了。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当时拉萨的叛乱已平息，但山南（Loka 或 Takun）地区的叛乱还在继续。这次会议只宣布了会议的召开和承担政府责任。筹委会领导成员接着起程赴北京出席代表整个中国政府的全国人大会议。成员中有